

青推荐

纪录片《两岸家书》——

“他们的身心与祖国同频共振，他们的中国魂从未丢失”

□余岱宗

六集纪录片《两岸家书》以极富历史意味的书信个案为资讯窗口，展示17世纪至今两岸人民之间血溶于水的密切关联。这些家书往来，情感交往是其核心纽带，而书信中所记载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内容，亦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两岸家书》所展示的，是近代以来两岸人民通过书信往来显现出的心态史。

以纸质书信为载体的心态史叙事，以心灵交流为内核，两岸日常生活中的经济文化、思想习俗等各种社会面貌亦包含其中，这让纪录片具备了可观的社会历史档案价值。然而，再琐细的日常生活细节的呈现，其围绕的核心，依然是人与人之间无法割舍的血脉与精神的关联。《两岸家书》的可贵性在于，作为历史的亲历者，片中诸多直接或间接当事人皆年事已高，画面中，他们对命运、对历史的言语表述同样珍贵。摄影镜头朝向这些人，朝向他们因书信而触发的对命运所呈现出的复杂情感，也朝向他们爱与恨、遗憾与期待的表述，这些活生生的言语表达同样是珍贵的历史记载。可以说，《两岸家书》从文字出发，为读者呈现的是带着历史体温与时代表情的当下之理解、当下之解读、当下之感慨。历史的沧桑感，透过当下直观的心灵跃动，具象地呈现在受众之前，形成此部纪录片最具力量感的视觉张力。

家书的呈现当然以文字语言为主，而家书的理解者与解读者的意义传达，则以文字语言与身体语言交织为表述手段，甚至身体语言不时占据了表述的主导地位。这样，我们不难发现，文字语言不断通过身体语言的“转译”，不断通过当下两岸同胞直接的解读、分析和对话，伴随着理解者与解读者来往于两岸的旅途奔波，让家书的历史意义在两岸亲朋好友和专家学者共同解读中得以延续。因此，这也可以看作是两岸人共同解读两岸家书的一段影像记录。家书成为两岸人共同拥有的记忆之场。

这些家书中的一段段历史记忆，浸泡着汗水与血泪。第一集《我从唐山携梦来》叙述



纪录片《两岸家书》中出现的珍贵影像(节目组提供)

的是18世纪初闽南士子张士箱带领族人到台湾垦拓的经历。流传至今的100多封家族文书与信件，时间跨度近200年，见证了张士箱家族在宝岛蓬勃发展的历史。然而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迫使张士箱家族走向衰败，两岸族亲亦飘零四散。张士箱家族往来于台湾与大陆的文件与书信，既是家族的兴衰记载，更是国族命运的真切回声。如此，《两岸家书》影视书写的独特意义，便在于以书信为窗口，去窥见时代风云中的诸多个体的磨难与抗争，去探测两岸百姓的无法割舍的情感关联之浓度与深度。

隔着海峡，书信往来的情感表达却愈发热烈；地理的阻隔，却蓄积起更为澎湃的恋人絮语。第五集《依窗犹识梦中人》中，台湾老兵王德耀与湖北浠水发妻刘谷香的故事便令人唏嘘。王德耀与刘谷香通信近200余万字，从隔绝时期的独自倾诉到两岸通信开放后的互诉衷肠，从青梅竹马的两情相悦到悲喜交加的黄昏恋情，超过30余年的别离，跨过万水千山，终于以大团圆的结局为爱画上无比感伤亦无比愉悦的句号。

当然，并非每个离散者都如老兵王德耀

那般幸运，纪录片同样叙述了无法疗愈的创伤。第五集中，曾是军法官的高秉涵，13岁告别母亲之后，便留下了“一生不吃石榴”的创伤。常年放置在高秉涵家中的老兵骨灰坛，不仅高秉涵的女儿司空见惯，连高秉涵的第三代后人都习以为常。当年的军法官高秉涵成为老兵魂灵的护佑者。32年间，高秉涵不断往返海峡两岸，一路喃喃细语，与逝者对话，将近200位台湾老兵的骨灰抱回故土安葬。高秉涵送回的是老兵的魂，疗愈的是逝者以及他人未愈合的创伤。同样，另一位信使田圻畅，一位老兵的儿子，1984年始，便将自己任香港轩尼诗道德兴大厦中60平米的小屋开放给离散家庭。轩尼诗道上的的一处公寓成了两岸会亲者的“鸟巢”。经田圻畅的联络，1000多封家书来往两岸，700多个离散家庭在香港的“鸟巢”得以重逢。在高秉涵、田圻畅这样的信使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至善的力量，一种跨越鸿沟、愈合创伤、去除偏见的精神力量。

如果说高秉涵、田圻畅这样的人是愈合两岸离散者的情感信使，那么，第三集《半百青春不留白》聚焦的许寿裳、台静农这样的

知名学者便是跨越海峡的文化信使。1896年始，长达50年的殖民历史，导致六百万台湾人民中近七成已习惯使用日语生活。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许寿裳受邀飞抵台湾，主持编译馆，编印台湾中小学的国语教科书，本人亲自编写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教台湾同胞如何循序渐进地过渡到使用国语和国文。阅读许寿裳的书信，不难发现这位知名文化人为光复后的台湾重建中华文化的拳拳之心。而就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台静农，默默接续了鲁迅与许寿裳的启蒙理想，与许世瑛并肩同行，为台大中文系培养了众多文化英才。这些自觉肩负传播中华文化职责的知名人士，能在《两岸家书》中开出长长的名单，连横、张我军、蔡培火、林海音、蒋渭水等知名人士，他们的身心与祖国同频共振，他们的中国魂从未丢失。

爱国诗人与史学家连横的文言纪传体通史《台湾通史》明确记载了台湾与大陆密不可分的关系。近年，连横的曾孙女连惠心将《台湾通史》翻译成白话文。连惠心面对镜头言说《台湾通史》的历史意义，其文化信使的形象跃然屏上。影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连横、连震东、林文月、连战、连惠心、林焕文、林炳文、林海音、夏祖焯，他们之间不仅仅是血缘的关联者，更是思想文化层面的联盟者与赓续者。

这部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哔哩哔哩、中国外文局国际传播发展中心、福建教育出版社联合出品的纪录片《两岸家书》，以家书为导引，兼及先贤的著述、诗文，聚焦亲友之间书信往来与具体历史语境的高度呼应，梳理代际情感与思想的传承，勾勒中华文化得以发扬的情与思之脉络，感知爱国情怀得以延续的源与流之关联，从而以文字与影像交织呈现的方式建构跨越海峡的中华文化思想以及爱国情感的记忆之场。于当下，是情感记忆与思想文化记忆的再度描述与确认，是一次族群共同体意识的再度召唤，更是朝向未来的深情期待。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青观察

CityWalk：关于城市的感觉

□重木

城市或许是一种感觉，因此当City-walk之风兴起，或是“city不city”成为一种你与我之间的某种共鸣时，年轻人关注的始终都是自己的感觉(Feeling)，即不仅仅只是置身于某个物理空间中的感受，而是通过自身的行动、探索和实践所创造出的一种氛围感。所以Citywalk是旅游或走马观花，但更重要的是通过walk而使身体与城市空间产生密切的联系，二者共振。“Walk”是一个现代行为，尤其在波德莱尔与本雅明那里，它所展现出的不仅仅是身体的行动方式，更重要的是这一行动形式本身所蕴含的某种生活与存在状态。他们把这样的形象称作“Flaneur”(漫游者)，而其典型的特征便是漫不经心、闲散、慵懒与漫游，即wandering的状态。

Citywalk的精神来源或许与本雅明著名的城市漫游者形象息息相关，但更大程度上它其实是现代城市商业与消费文化的产物。本雅明所迷恋在兹的拱廊街在当下的城市空间中迅速扩张，不断地通向各种商店街、购物中心与骑楼。区别于漫无目的的闲逛，当下的Citywalk与其说是探索未知的城市，不如说在探索之前，人们就已经从各种旅游指南或小红书上查找了关于某个景点的所有相关资料，我们跟着别人的推荐和攻略去Citywalk，或是通过它来印证那些早已普遍流行的东西。因此这样的“walk”往往不会发现新的东西，城市已经被各种资讯与介绍扒光，赤裸裸的一览无余，而那些暧昧、晦暗与隐藏的东西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过分刺目的手机闪光灯刺透而无处可藏。Citywalk知道的太多，它符合当下我们的生活——计划完善地去完成或实现某个目标。

正是在这里，Citywalk又区别于波德莱尔与本雅明的Flaneur与wander，对后者而言，城市意味着对于陌生与差异的体验，它关乎我们与城市的具体感觉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新感觉派小说中，故事中的核心主角实则并不是那些沉迷于光影与享乐的青年人，反而他们存在的城市空间才是主角，而恰恰是城市本身作为某种叙事氛围才使得人们能够切身体会——穿过我们的身体——感觉到何谓城市性，或说现代性。然而正是这种感觉能力的匮乏，导致现代城市再次退化成为一种具体的物理空间，尤其伴随着消费与商业文化的兴起，而使得

它成为一个又一个需要打卡的景点，无论是上海武康路上几朵郁金香，还是郭敬明笔下的梧桐区，walk于其中的个体始终遵从着某个计划，清除陌异后，便不会再有意外与偶遇，有的只是在路的尽头掏出手机拍照发朋友圈。

这里似乎不再存在如波德莱尔所憧憬的差异，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相似性，就如韩炳哲在其《他者的消失》中所指出的，差异性的消失既是当代消费文化的产物，同时却也是它赖以发展的动力。因为正是通过不断地生产出各式各样的中介来替代消失的差异，才使得当下的人们不断地希望通过不同来展现自我的独特性，然而消费者最终会发现，他千方百计所塑造的独特性本身已经成为当下相似性的结构元素，即独特就是相似。

或许正是人们渐渐意识到这种不再具有深度的相似性，导致当下的年轻人逐渐厌倦了旅游，或是他们总是期望能找到一个不同的、还未被染指的地方。这背后潜藏着某种强烈的焦虑，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当下城市空间的萎缩与城市形象的同质化，但或许更重要的是人们逐渐意识到匮乏的不仅仅只是这些环境，还有我们自身的感知、想象与欲望能力。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人们不再wander而是直达，不再好奇而是提前计划，不再旅游而是打卡……最终看到的景色也并无新意，有时甚至可能更差。曾经在各种浪漫故事里出现的傍晚散步、偶遇与陌生如今被安全目的所抹除。旅游是为了恢复元气，恢复元气是为了继续工作，如此循环往复，个体的感觉也随之被规范化而逐渐成为工作的工具，不再具有幻想的冲动。疲惫感成为当代年轻人普遍的身体与精神状态，但却并非如Flaneur般的慵懒，前者是力比多(libido)的匮乏，后者则是存在的状态。

在章子的长篇小说《撞空》中，年轻的主角所遭遇的城市空间——从工作场所、出租屋到与恋人吃饭的商场——我们都熟悉，



上海街头的Citywalk 许海峰供图

而也恰恰是这种日常性的熟稔导致人们的感受已经难以从其中获得新的、不同的东西，由此也使得每个人的生活发生内陷而逐渐形成一种流水线般的形象。这几乎成了当下许多青年作家笔下的典型形象：他们生活在城市中，虽然walk却对谁都漠不关心，出门社交但却始终没能突破自我的围墙，难以与他人形成真实的联系，而他们好似黑夜一般，依旧不可理解，人们似乎也失去了想了解的欲望……这一内部的耽溺与坍塌最终导致世界的荒漠化(阿伦特语)。我们会发现，年轻人对城市渐渐失去了漫游的兴趣，取而代之的是伴随着各种目标能否实现而产生的疑惑。

无论是walk还是wander都依赖于身体的动作，迈开脚才会有下一步，而城市的诞生和塑造恰恰就建立在身体的行动上，所以简·雅各布斯才会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批判传统包豪斯功能主义的城市设计观点，而把城市性看作是空间活力与多样性的产物。人们通过生活(bios/living)于此而形塑出城市的模样，而非仅仅存活(zoe/survival)于其中，生活意味着陌生与复杂性，而生物性的存活总是相似的。也正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当下的Citywalk更像是中产不断发明以及希望由此能够塑造自身阶级形象的工具，与当初的飞盘、Lululemon与当下的骑车等项目如出一辙。而对于年轻人而言，这是新的网络潮流，时髦的梗，因此他们积极地希望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一份子，没有人愿意落伍，追逐热点，成为当下

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所以，还有谁不知道“city不city”的梗？还有谁不想去City-walk？它既是自我形塑的重要构件，也是当下的流行文化，它并非来自于漫游的偶遇与意外，而往往是消费与商业文化精心炮制的新热点。

无论是波德莱尔的艺术巴黎还是穆时英的魔都上海，这些城市形象往往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即一方面它们的城市规划与建筑都建立在理性与科学的设计观念上，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遭遇生活于其中之人的形塑与改变，它们身上都显现着雅各布斯所推崇的城市性：生机勃勃的多样化。因此漫游者能够在巴黎的大街小巷闲逛而不会遭遇城市设计的阻拦或禁止，而刘呐鸥与施蛰存故事里的年轻人之所以能在夜晚的上海游荡，不仅借助朦胧的路灯之光，也依赖它的晦暗，否则他们或无容身之处或难以遭遇他者……当下的城市早已失去了模糊性与暧昧，取而代之的是功能性的道路，规范性的空间与边界分明的社区，本雅明的漫游者在此将不断地遭遇各种障碍与围墙、禁止标识与不可穿越，漫游不再可能，因为它随时都会被打破。我们与漫游者于现代城市中所获得的身体感觉早已不同于，汤姆·沃尔夫在其《从包豪斯到我们的豪斯》中把现代建筑无情地称作水泥“盒子”，其千篇一律不仅违背自然也遗忘了传统建筑与人的关系。当下人们Citywalk的“city”正是沃尔夫所讽刺的形象，它既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诅咒。

在当下青年作家的故事里，现代城市的形象逐渐被虚化，或是被一种怀旧的、想象的城市感所取代，如王占黑《空响炮》故事中的那些上海里弄。但奇怪的是，相较于王安忆《长恨歌》与金宇澄《繁花》中的城市景观，王占黑故事里的上海反倒并不“现代”。而更多的小说或选择退回农村，幻想志怪，或回忆乡魂，缅怀青春，唯独城市，似乎依旧格格不入。城市是现代性的产物，从《金瓶梅》到张爱玲的上海传奇，传奇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因陌生而产生的偶然性，它依赖于个体性与身体感官，依赖于行动的意愿。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性即现代个体存在的方式——陌异、独立与自由，但很显然，从波德莱尔与本雅明那里出发的flaneur最近走向城市景点前的打卡者，他们Citywalk，在一个封闭的盒子中。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

青年说

“在1984年的7月29日，许海峰为中国射击在奥运会上拿到第一块金牌，整整四十年的时间，穿越四十年的时空，年轻一代射击运动员向他们的前辈致敬！而中国射击队也始终走在世界最顶尖的阵营中！飞弹穿云雾，心中只一点。”这是被誉为“足球解说诗人”的贺炜对本届奥运10米气手枪决赛的解说。

奥运会结束了，但内心的感动依旧。贺炜的这段解说词，既有对中国奥运夺金历史的回顾；也展现出40年里中国射击队的传承和发展，及其始终走在世界最顶尖阵营中的原因；而“飞弹穿云雾，心中只一点”则是其诗情迸发凝定的金句，“飞弹”穿越的是枪口到靶心的距离，也是赛场紧张的气氛，“雾”，而“心中”的“一点”，既是指射击的靶心，也是运动员的专注的内心。

对观众来说，解说员就像“导游”，不仅要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复杂的陌生的赛事信息转化为观众眼前的清晰画面，更要用话语精准放大那些稍纵即逝却直击人心的瞬间，带观众领略到每一次冲刺、每一滴汗水背后的故事，从而达到场内外的情绪共鸣。

中国花样游泳选手用了一万五千个日夜，从北京陶然亭公园的室外游泳池到登上最高领奖台，让梦想照进现实；孙颖莎对战倪夏莲，世界第一和世界唯一完成了乒乓世界的传承和交接；郑钦文以李娜为偶像，遵循其轨迹一路成长，经历磨难和挫折，始终薪火不灭……只有对这项运动有足够的理解，对运动员有细微的体贴，对他们成长路上的坎坷艰难有共情和理解，解说员才能补足观众的

知识缺陷，唤醒观赛的热情，从而进入到赛场的氛围中，感知运动员的欢欣或失落，进而感慨他们荣耀背后的踏实和坚持，化为自我生命的精神注液。

奥运解说词的意义在于，要准确播报，最大限度地提供给观众有用的信息，加深观众对赛事本身的理解和认同，在此基础上追求语言的典雅，唤醒观众的国家认同与民族情怀。无论是形容乒乓球运动员的“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还是赞美跳水运动中，中国队获得冠军。



在巴黎奥运会艺术体操项目集体全能决赛中，中国队获得冠军。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父犹能最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抑或是对张雨霏“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感叹……这些古典诗词的引用，源自解说员情之所至的自然流露，贴切而引人沉吟。

丰富而雅致的用词，简洁而明确的造句，表达的流畅性、感染力，构成了体育解说词动人心魄的力量，在观众心中余音袅袅，不绝于缕。

体育解说词对汉语语言的准确运用，并因此而走红，努力唤醒了一味追逐网络流行语的年轻人。网络流行语的复制、变异、传播如此简单，大量短视频使得年轻人在观看过程中逐渐习惯了“短平快”的信息接收方式。久而久之，“短平快”取代了深度思考，“感官刺激”取代了“理性思维”。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扼杀了个性化表达，语言词汇量被人所缩小，那些充满创造力的表达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就算是“辞达而已矣”，但“辞达”本就是高要求，务求精准而丰富。

不只是文学需要准确典雅的语言，日常生活的交流也是如此。如何努力用差异化的语言表达内心独特的感受，而不是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网络用语来表达情感，似乎已经成为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难题。面对美景，只会用“好美”形容，会让风姿各异的景象失色和雷同；面对运动员的突出表现，只会用“真牛”形容，会让不同个体间的技术差异和风格特征泯灭。准确而诗意的语言表达，会体现貌似相同景物事物间的细微差别，从而有效传达语词之后的生动情感。

汉语之美，在音韵，在形体，在表达之后引发的情感认同。在击剑比赛中，解说员形容老将孙一文一剑定乾坤时用“桃花影落飞神剑，一剑光寒定九州”，既有古典诗词的雅致和音韵之美，也很好地将孙一文击剑赛场上飘逸飒爽的英姿呈现在观众面前。在数次平分的情况下，孙一文找准机会，一剑封喉，赢得干脆利落。更重要的是前一句是金庸形容桃花岛的对联，后一句化用贯休的“一剑霜寒十四州”，前者令人想到黄药师的落英神剑，青光激流，剑花点点，落英缤纷，潇洒俊逸；后者一个“定”字，气势轩昂，舍我其谁，使气满怀，令人神往。

看似平常的物事，用不平常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让这个事物特性凸显出来，扩大了语言的表意空间，反映出的是表达者的理解深度。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反映出来的是人的思维品质和深度。比如体操男团比赛中中国队痛失金牌，面对张博恒的眼泪，解说员说：“这是他的第13套动作，资格赛比了6套，在团体赛中，他上满了6套，他是队长。当我们拿到资格赛和团体赛出场顺序的时候，真的是军书十二卷，卷卷有其名。”由痛失金牌的眼泪到生命的成长，从张博恒护至所有的运动员，其中生发出对热爱、付出和失败的认识和思考，引发现观众长久的感叹，形成情感和审美的回响。

语言负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丰富的心灵史信息。太初有字，字是中华民族心灵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追求语言表达的准确雅致，某种程度上就是守护民族的文化心灵。当拥有充实的生活、丰盈的阅历、厚重的阅读，才能养成语言的敏感和表达的传神传情，如此之后，语言才可能用来充实和发展内在素养、滋生和增长终身能力。

(作者系北京四中语文老师)

从奥运解说词看「汉语之美」——守护语言，就是守护民族的文化心灵

□王志彬